

明清广西方志“荆扬分野”问题探研

何俊宇

提 要：秦汉以降，广西分野经历由独属“扬州”到荆、扬两种分野类型并存的转变，实际上是广西走向高层政区之路的缩影，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这一转变过程总体上呈现“荆州”分野南拓，“扬州”分野东缩的态势，最终形成了广西东部梧州府数县属“扬州”分野，其余西部府州县皆属“荆州”分野的特殊局面，这也正是天文分野理论与实际空间位置相适应的结果。包括南宋蔡戡在内的学者对“荆扬分野”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建构，而后世的广西方志修纂者基本因袭旧说而不加创造。方志修纂者对于天文分野的态度不一，各自在志书中表达了关于天文分野归属的认识和态度。

关键词：广西 地方志 分野

在传统天文分野学说中，天上星宿与人间政区遥相对应，共同构成森严的天地秩序，对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领域均产生深远影响。学界历来重视分野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较早出现在天文学史领域，而近年来从知识史、地理学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相关研究成果亦层出不穷。^① 明清地方志中保存有丰富的有关天文分野的记载，田天、孟凡松分别挖掘方志中的相关材料，对明清时期山东、贵州地区分野学说的嬗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② 前人时贤的研究可谓详备，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地方性的个案研究。有鉴于此，笔者立足于明清方志资料，对广西“荆扬分野”问题的形成过程、历史书写及涵义进行考察，以期补充相关领域的研究。

一 广西“荆扬分野”问题的形成与嬗变

孟凡松指出，作为王朝版图的“新疆”和省级政区中的“迟到者”，明清贵州需要利用星野作为理论工具论证其在王朝疆域体系中的空间位置。贵州方志分野有“荆州”和“梁州”两种类型，他将其称为“星野歧论”。^③ 与之相似，明清广西方志中也存在“荆州”（对应星宿“翼轸”）和“扬州”（对应星宿“牛女”）两种类型分野，但其形成和嬗变的历史过程更

① 参见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周亮、李勇：《中国古代分野理论中分星变化的原因考究》，《天文研究与技术》2013年第3期；宋京生：《旧志“分野”考——评古代中国人的地理文化观》，《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4期；李智君：《分野的虚实之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田阡、孟凡松：《空间表达与地域认同——以武陵地区清代方志星野为例》，《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

② 参见田天：《因袭与调整：晚期方志中的分野叙述——以山东方志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孟凡松：《清代贵州郡县志“星野”叙述中的观念与空间表达》，《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孟凡松：《晚清知识、观念及其叙事转型——基于贵州五府名志星野志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③ 孟凡松指出，贵州各地分野均“属楚”或“属蜀”却不能“属黔”，所对应的翼轸、参井（或井鬼）各宿仅能占得其“余”而不能得之“正”，折射出贵州各地在政治认同上的尴尬。参见孟凡松：《清代贵州方志的星野歧论与政区认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期。

为漫长曲折。

历代分野学说至少多达十余种,较为常见且影响深远的是二十八宿分野、十二次分野。先秦时代,岭南地区属“百越之地”,实未纳入中原政权的分野体系之中。秦汉时期,岭南地区才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史记》《汉书》等著作也相应地出现关于岭南分野的记载。《史记·天官书》载:“牵牛、婺女,扬州。”^①《汉书·地理志》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②邱靖嘉认为,《史记》将岭南归入二十八星宿分野的十二州系统,而《汉书·地理志》将岭南纳入的是十三国系统。^③

秦汉以降,岭南的分野也逐渐发生变化,尤以唐宋两代的变化最为剧烈,其间所涌现的学说为广西“荆扬分野”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晋书·天文志》载:“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④,于辰在丑,吴越之分野,属扬州。……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为鹑尾,于辰在巳,楚之分野,属荆州。”^⑤唐代李淳风撰《法象志》,将唐代州县配以《汉书》所记十二度次展开研究,僧一行则提出了著名的“山河两戒”说,两人均对分野学说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根据《旧唐书·天文志》记载,“翼轸,鹑尾之次”是所谓“荆州”的分野,其所涵盖地域甚广,“又逾南纪,尽郁林、合浦之地。郁林县今在贵州。定林县今在廉州。今自富、昭、蒙、龚、绣、容、白、罕八州以西,皆属鹑尾之墟也”^⑥。“南斗、牵牛,星纪之次”则是所谓“扬州”的分野,“尽苍梧、南海。又逾岭表,自韶、广、封、梧、藤、罗、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东为星纪,其西皆属鹑尾之次。古吴、越及东南百越之国,皆星纪分也。”^⑦《新唐书·天文志》之记载与《旧唐书·天文志》大致相似,其志载:“翼轸,鹑尾也。……又逾南纪,尽郁林、合浦之地……自富、昭、象、龚、绣、容、白、廉州已西,亦鹑尾之墟。”“南斗、牵牛,星纪也。……迨苍梧、南海,逾岭表,自韶、广以西,珠崖以东,为星纪之分也。”^⑧岭南地区原本不在“九州封域之内”,故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典》新增《古南越》一篇,其文载:“(古南越)在天文,牵牛、婺女则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⑨所谓“兼得楚之交”,意即“古南越”与“古荆州”之间有部分地区相交^⑩,故旁有小字注为“汉零陵、桂阳,今始安之北境

① 《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330页。

②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69页。

③ 参见邱靖嘉:《“十三国”与“十二州”——释传统天文分野说之地理系统》,《文史》2014年第1辑。

④ 所谓“星纪”为十二星次之一,对应二十八宿中之斗、牛二宿。《明史·天文志》引《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谓:“《晋天文志》分野始角、亢者,以东方苍龙为首也。唐始女、虚、危者,以十二支子为首也。今始斗、牛者,以星纪为首也。古言天者皆由斗、牛以纪星,故曰星纪,是之取耳。”参见《明史》卷25《天文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67页。

⑤ 《晋书》卷11《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08—309页。

⑥ 《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14页。

⑦ 《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第1316页。

⑧ 《新唐书》卷31《天文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823—825页。

⑨ 杜佑著,颜品忠等点校:《通典》卷184《州郡一四》,岳麓书社,1995年,第2567页。

⑩ 邱靖嘉解读《通典·州郡典》所载分野部分,总结出三类主要情况,其一为:“若某州的大部分区域与某国重合,但此外还有一部分区域延伸至其他邻国,这时便以与该州存在主要包含关系的列国分星作为该州之分野,并在其后注明该州与其他诸侯国领土相交的情况。”参见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第162页。

及始兴，皆宜属楚”。至此，岭南不再独属“扬州”的分野，而是一分为二，形成东属粤（越）—“扬州”分野区，西属楚—“荆州”分野区。

明初，朝廷编纂《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此书参考前代包括《汉书·地理志》和两唐书《天文志》等重要著作，其内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明史·天文志》中有关分野的篇章。韩道英指出，该书体例是先介绍某地分野所属之辰次，然后将星次与所对应的地区详细罗列在后，再对照《新唐书·天文志》的星次分野，具体介绍各地的建置沿革。^①在这一编纂体例的影响之下，岭南地区两大分野区共存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强化，两者之间的界线更为明显。《明史·天文志》载：“斗三度至女一度，星纪之次也。……广东布政司所属之广州府亦牛女分。惠州，女分。肇庆、南雄二府，德庆州，皆牛女分。潮州府，牛分。雷州、琼州二府，崖、儋、万三州，高州府化州，广西布政司所属梧州府之苍梧、藤、岑溪、容四县，皆牛女分。……张十六度至轸九度，鹑尾之次也。……广西所属除梧州府之苍梧、藤、容、岑溪四县属牛女分，余皆翼轸分。广东之连州、廉州府钦州、韶州府，皆翼轸分。”^②有学者指出：“广东天文分野是荆扬二州交错之地，广州以东入扬州，连州、高州以西入荆州。”^③但仅就广西而言，总体上呈现“荆州”分野南拓而“扬州”分野东缩的态势，最终形成了广西东部的梧州府数县属“扬州”分野，西部绝大多数府州县属“荆州”分野的特殊局面。

二 明清广西方志“荆扬分野”的历史书写

地方志是传承分野学说的载体之一，明清广西各地方志一般都会有专门的篇章介绍当地的天文分野。相对于历代正史《天文志》（或《地理志》）等经典而言，方志的地位无疑是居于其后的，其内容不可有悖于前者。另外，对于天文分野的研究有较高专业要求，而方志修纂者未必具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故一般因袭前说而不加以创造。就其内容而言，广西方志修纂者通常会引用历代正史《天文志》（或《地理志》）及有代表性学者的学说，并稍加论述。

（一）南宋蔡戡对广西分野的建构

关于广西“荆扬分野”问题，南宋蔡戡之说可谓一锤定音，如嘉靖《广西通志》称赞道：“广西为楚粤裔土，故分野有荆扬之殊，考诸往牒，其说盖纷如也，今以宋蔡戡之论为定。东界北接吴者属扬，为星纪、牛女之分。西界北抵楚者属荆，为鹑尾、翼轸之分。”^④蔡戡，字定夫，常州武进人，系北宋名臣蔡襄四世孙。他曾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并著有《静江府图志》12卷。^⑤蔡戡是广西地方分野体系重要的建构者，明清两代《广西通志》附有他所撰写的《分野总论》，“对广西分野作纵横论述，颇为详尽”^⑥，因此许多广西府县志都会收录其说。

以雍正《广西通志》所收录《分野总论》为例，蔡戡从天文、地理、历史等多个角度展开

① 参见韩道英：《〈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考释与历代“星野”变迁》，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页。

② 《明史》卷25《天文志一》，第367—369页。

③ 李默：《广东方志发展史略》，《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侯月祥：《历代广东地方志编修简述》，《岭南文史》2012年第4期。

④ 林富修，黄佐纂：嘉靖《广西通志》卷4《表二·分野》，嘉靖十年（1531）刻本，第1页。

⑤ 参见钟振振：《南宋蔡戡小传订补》，《江海学刊》2008年第6期。

⑥ 韦韩韞：《广西旧方志增加资料信息量的主要途径》，《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5期。

了对广西天文分野体系的建构。首先，他批驳了所谓“前史”“近史”之误。他认为：“凡迂固以来谓斗牛女为吴越之分野，并属扬州者，皆指越之东界以累世立国之地言之。”因此，他不赞同《汉书·地理志》“并以郁林、苍梧所属之郡在越之西界者为牛女之分野”的做法，并且指出“杜佑之作《通典》，欧阳文忠公之志《唐书》^①，东坡先生之《指掌图》^②，皆以为前史之误也。”他进而指出：“自古谓之‘百粤’，虽东极于会稽，西则抵西南之界，其北界虽接吴，而其西北实抵楚。列宿在天所主之分野，随方所向，皆当逾天际天而后止。《周礼》：‘东南为扬州，正南为荆州。’其接吴者为扬州，则星纪之分并在东南方也。固不应罄折而西转，以抵正南之方荆楚之界，而并为星纪之分野也。且翼轸所向正南之方亦不应至始安而终止，而始安以南遽斗牛之分也。《通典》之说曰：‘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扬斯？’不然矣，此近史之误也。其大概以为，岭南之地分野所属，其西界当属荆州翼轸之次耳。”^③

唐代僧一行、李淳风的学说是蔡戡有力的理论武器。蔡戡指出：“又一行禅师用李淳风之说，以《分野图》云，自韶、广、康、封、梧、藤、罗、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东为星纪，其西北属鹑尾之次，以此参订，则越之东界其北接吴者属星纪，实斗牛女之分野；而越之西界其北抵楚者属鹑尾、翼轸之分野。前史之差谬至是，而后较然明甚。”他利用这一理论，对任职之地静江的分野进行论证，“虽然静江在唐为桂州，属岭南道，在汉为始安，属零陵郡，今支邑之荔浦汉属苍梧郡，桂林新旧志不考诸家之说，遂以始安属荆为翼轸之分，荔浦以南属越，遽以为牛女分，盖承前史之误耳”^④。蔡戡之论无疑是对僧一行等人学说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广西方志天文分野的影响是较为重大的。“惟兹百粤，或以为星纪牛女，或以为鹑尾翼轸，至一行以粤西之西北当属翼轸，东南当属牛女，蔡戡主以立论而聚讼始息。”^⑤

（二）明清广西方志对于“荆扬分野”的认识与态度

除了天上的星宿之外，地上的山川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分野的划分起到了参照物的作用。在广西方志中，修纂者对本地所属分野有其独特的认识，可见一斑。雍正《广西通志》内有一则颇为值得注意的史料：“粤西去衡（阳）不过千里，而湘江与漓江同源而异流，则其属荆州也明甚。……即按其气候，近西者寒燠平中，田禾岁只一收；其近东者，燠多寒少，田禾岁有两熟。气候既殊，分野亦当各别。”^⑥修纂者认为，除了梧州府数县之外，其余各地宜属“荆州”分野。其理由有二：一是湘、漓二水同源而异流，意指两个流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是广西东、西部的气候有别，作物熟制不同，故分野之归属亦有所差异。

古人认为湘、漓二水同源，如《水经注》称“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⑦。湘江发源于今广西海洋山，漓江则发源于今广西猫儿山，两江发源地虽近但实际上并非

① 即《新唐书·天文志》。

② 即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作者托名为苏轼，实非。经郭声波考证，其实际作者应为北宋人税安礼。参见郭声波：《〈历代地理指掌图〉作者之争及我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③ 金鉷修，钱元昌等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星野》，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第13—14页。

④ 金鉷修，钱元昌等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星野》，第14页。

⑤ 金鉷修，钱元昌等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星野》，第1页。

⑥ 金鉷修，钱元昌等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星野》，第16页。

⑦ 酈道元著，陈桥驿译注，王东补注：《水经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14页。

同源，古人对此认知有误。尽管如此，方志修纂者仍将其作为判断广西属于“荆州”分野的依据之一。至于因广西东、西部之间气候不同而导致的作物熟制差异，嘉庆《广西通志》则记载：“稻梗种类各府略同，浔、梧以南均一岁再熟，唯桂林、平乐、庆远及柳之怀远近北之地，则一熟耳。”^①此语所反映的广西各地区之间熟制的区别，更似南北差异而非东西之别。况且，梧、浔二府均为一年两熟，又为何分属不同的分野区？依笔者之见，这两个理由虽然不完全是基于科学层面的认知，也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疑，但却直观地反映了方志修纂者为分野“自圆其说”的态度。

在清代广西方志之中，“扬州”分野区还呈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仅存被称作“江南绣东”^②的一小片区域。例如，雍正《广西通志》所载《轸宿考》一文分别将梧州府及郁林直隶州定为“轸宿六度”和“轸宿十一度”，又分别在两处加上“大江以南，绣江以东入于女”以及“南流江东入于女”的小注，试图以河流为界将一小部分地区保留在“扬州”分野区之内。^③

乾隆《梧州府志》修纂者虽按照成例著有《星野》一篇，文内也收录了历代相关分野学说，但其修纂者在篇末却说：“‘江南绣东入于女’亦姑存其说耳，岂必沾沾焉？于一郡之中分星野哉。”^④这反映出编纂者对天文分野之说的冷淡态度。与之相似的还有光绪《容县志》，其志载：“至李《通志》^⑤则以梧之苍、藤、怀属牛女，容、岑属翼轸。金《通志》^⑥则以梧当轸六度，绣江以东入于牛女，界限厘然，似亦确有所见。究之诸家之说，深求之，皆荒渺无凭。况一隅小乘尤不必侈陈天象，遗议大雅，但以旧郡邑志久存其说，未便删没，谨节录正史而缀旧志图说于后，不复加考焉。”^⑦

今广西钦州在明清时期隶属于广东，按《明史·天文志》的记载则钦州处于翼轸之分，属于“荆州”分野。雍正《钦州志·分野》篇末收录了一小段方志修纂者的考辨，颇为值得注意，其文载：“按地志有以广东为扬州南境，广西为荆州南境，梧逾高凉之北，廉绕浔、邕之南，藤、梧、封以东为牛女，则廉、浔、邕当为翼轸。诸说不同，但考宋熙宁八年十月，彗星见轸，未几交阯陷钦、廉、邕三州。明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彗星见轸，至十二月交阯复陷钦，则钦属轸也明矣。”^⑧这段文字至少反映出两个信息：其一，旧志对分野的划分比较笼统且体系不一，即广东大致上对应“扬州”，广西则对应“荆州”，故当时隶属于广东的钦州理论上应该属于“扬州”分野；其二，《钦州志》的编纂者更认同“荆州”的分野，并将宋、明两代安南入侵的战事与星象学说联系起来以增强论证的合理性，这也是我们认识方志修纂者对于本地分野之归属的生动案例。

（三）广西分野转变原因蠡测

蔡戡指出，“凡欲知星文之所系，先考郡国之所属”^⑨。换言之，分野与政区互为表

① 谢启昆修，胡虔纂：嘉庆《广西通志》卷89《舆地略十》，嘉庆六年（1801）刻本，第1—2页。

② 即“大江以南，绣江以东”，指广西境内西江干流（今称浔江）以南，绣江（北流河）以东的区域，地在今梧州市龙圩区、藤县、岑溪市及玉林市容县。

③ 金鉷修，钱元昌等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星野》，第10页。

④ 吴九龄修，史鸣皋纂：乾隆《梧州府志》卷1《舆地志》，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第7页。

⑤ 即清雍正四年李绂主修的《广西通志》。

⑥ 即清雍正十一年刊刻的金鉷修，钱元昌等纂的《广西通志》。

⑦ 易绍德修，封祝唐纂：光绪《容县志》卷2《舆地志二》，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第1页。

⑧ 董绍美修，吴邦瑗纂：雍正《钦州志》卷1《分野》，雍正元年（1723）刻本，第3页。

⑨ 金鉷修，钱元昌等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星野》，第12页。

里。一旦人间的政区出现变动,那么便要从天文分野的角度进行一定程度的调适,如西汉刘向将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新置苍梧、南海等郡县划入越地分野。这正如田天所说:“随着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张,西、南方的分野不断被调整,新的区域加入原属西南方向的分星”,“后世在沿袭分野时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传统分野理论与本朝实际的区划相契合”^①。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广西“荆扬分野”的转变,实际上是广西走向高层政区之路的缩影。有学者认为:“方志的星野叙述并非地方空间位置的纯粹表达,更是地方构建政区认同的重要形式。”^②唐代广西逐渐形成桂管、容管、邕管(即“三管”),其政治、军事地位得到提升。唐咸通三年(862),原岭南道划分为东、西两道,此举通常被视为两广分治的开端。及至宋代,分置广南东、西两路,各自形成独立的高层政区。元代,两广地区大致分属江西、湖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1363),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改为广西等处行中书省。明清两代,广西仍作为一个高级政区而存在。虽历宋元明清数代,辖区或有变动,政区名称不尽相同,但广西作为一个高层政区的地位基本未变。在此背景下,广西全境若继续依附于“扬州”的分野则显得不合时宜。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有二:其一,广西既已脱离“扬州”分野,为何选择接入“荆州”的分野?其二,广西东部梧州府数县为何仍属“扬州”分野?

笔者认为,凡高层政区必有相应的治所,而自广西形成高级政区以后其治所长期位于静江(今广西桂林)。古人在表述分野区域之时,经常使用汉代的行政区划,如《旧唐书·天文志》。桂林在汉代为始安县,属荆州零陵郡,自当划入“荆州”分野区,如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其载静江府为“翼轸之分,鹑尾之次”^③。《舆地纪胜》卷103至卷127记载了广南西路各府、州、军的分野详情。根据笔者统计,除去今属广东、海南的州军外,仅有静江、贺州、象州少数府州为“荆州”分野,其余十多个州均属“扬州”分野。而及至明初,广西“荆扬分野”的分布格局完全颠倒,仅有梧州府数县尚属“扬州”分野。可见,桂林长期作为广西的治所,在分野归属问题上所产生的带动效应无疑是显著的,或为唐宋以降广西“荆州”分野区逐步扩大的动因之一。

政区变动对分野调整的影响固然较大,但还需要与地理方位及天文分野学说的经典相符。从地理方位来看,东南方政区大体对应“扬州”分野,而正南方政区则对应“荆州”分野。既然广西已不再依附于“扬州”分野,那么符合广西地理方位的分野非“荆州”莫属。

而从天文分野学说的角度来看,广西“荆扬分野”的理论肇始于唐代,发展完善于南宋,而最终形成于明清时期。明清广西地方志的书写,势必要在遵守国家意志和前人学术成就的前提下展开。明清广西地方志将唐代李淳风、一行的理论尊为金科玉律,南宋蔡戡所言亦被奉为圭臬,故其志书中分野的书写必须要在实际空间位置和经典理论学说之间把握平衡。

《旧唐书·天文志》既载“扬州”分野“尽苍梧、南海”。此处使用了汉代的地理概念,而汉代苍梧郡治所位于今广西梧州市。^④为了与经典相合,《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将梧州府数

① 田天:《因袭与调整:晚期方志中的分野叙述——以山东方志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

② 田阡、孟凡松:《空间表达与地域认同——以武陵地区清代方志星野为例》,《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

③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3《广南西路·静江府》,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第1页。

④ 参见周伟峰、郭声波:《汉苍梧郡治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县分野纳入“扬州”分野之中，这一举动直接影响了后世方志的书写。雍正《广西通志》也间接佐证这一点：“天以九野分，地以九州画。粤西或以为荆，或以为扬。考之《禹贡》，其志扬之境曰：‘淮、海惟扬州。’是西北接徐、豫之境，东南则循海而南抵梧、藤而止耳，不应奄百粤而皆属于扬也。”^①此句“循海而南，抵梧、藤而止”岂不正对应“尽苍梧、南海”之语？故梧州府数县划入“扬州”分野较为符合相关天文分野学说。

总之，明清广西地方志“荆扬分野”的书写受到经典理论学说和实际空间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实际由地方官绅参与修纂的历史文献，地方志在贯彻国家意志之余，也为修纂者提供了一部分展开主观建构和论述的空间。在修纂者眼中，湘、漓二水“同源异流”，“江南绣东入于女”甚至农作物的熟制都可以作为鉴别当地所属分野的重要标准。这些行为固然有穿凿附会之嫌疑，但这不仅丰富了“荆扬分野”问题的内涵，还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人地理学思想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结 语

广西是一个边疆民族地区，历代王朝均将其纳入分野的体系之中，这无疑强化了广西对于中央的政治认同。但是，历代行政区划调整频繁，而天文分野学说的发展却相对迟缓，二者难以匹配，故从中衍生出种种矛盾，“荆扬分野”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广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独属“扬州”分野，转变为荆、扬两种分野并存的格局，实际上是天文分野理论与空间位置相适应的结果。这一转变过程恰好与广西走上独立高层政区之路相符合，并且发挥出作为一种构建政区认同的作用。在明清广西方志之中，修纂者对于天文分野的创见较少，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前人旧说，但也在志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尽相同的态度。有的修纂者为此牵强附会以证其分野归属，部分修纂者虽不能对被奉为圭臬分野学说彻底加以否定，但也在委婉地表达出自身的反思，成为我们展开研究的重要方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金铁修，钱元昌等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星野》，第16页。